

吕 达 周满生 主 编
刘立德 邹海燕 副主编

DANGDAI WAIGUO

JIAOYU GAIGE ZHUMING WENXIAN

当代外国教育改革

著名文献

(美国卷·第三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当代外国教育改革

著名文献

1990年 - 2000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

(美国卷·第三册)

吕 达 周满生 主 编

刘立德 邹海燕 副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三册) /
吕达、周满生主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ISBN 7-107-17375-8

I. 当...

II. ①吕... ②周...

III. 教育改革—文献—汇编—美国

IV. G5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0310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数: 420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册

定价: 34.40 元

◎ 编者前言

(一)《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选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著名文献。这套丛书按国家分卷,现有五卷九册,包括美国卷四册,苏联—俄罗斯卷一册,英国卷两册,德国、法国卷一册,日本、澳大利亚卷一册。

(二)从20世纪80年代起,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开始选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这项工作得到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赞助陆续出版,迄今已先后出版了七集,另有一个特辑《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出版了单行本。

(三)近20年来,《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教育科研工作者、比较教育工作者、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成为案头必备的资料书。但是,由于各集是陆续出版的,每集的印数又较少,不少读者未能备齐,抱有向隅之憾。

(四)《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一集第一篇收录的是美国1983年4月发表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那是一篇带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献。今年正好是那篇著名文献发表20周年。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也为了广大读者使用的方便,在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支持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一方面继续出版按年代选编的综合性的《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另一方面策划出版这套按国别选编的《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前者便于横向比较,后者便于纵向对照。

(五)我们除了对每篇文献的原作者表示感谢之外,还在适当位置注明了所有翻译者和校订者等有关人员的名单,既保护权益,又明确责任。

(六)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并热诚欢迎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

主 编

2003年4月

◎ 总目录

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	E. L. 波伊尔 (1)
要求学校做什么样的工作	美国劳工部获取必需技能部长委员会 (101)
建设社区——对一个新世纪的展望	美国社区学院未来委员会 (153)
美国 2000 年教育战略	乔治·布什 (205)
2000 年目标：美国教育法	(229)



学术水平反思

——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

E. L. 波伊尔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美国 普林斯顿

1990 年

目 录

谢 辞	(4)
前 言	(6)
第一章 学术水平内涵的演变	(8)
第二章 扩展视野	(17)
第三章 教师队伍：多种多样的才能	(25)
第四章 创造性合同	(35)
第五章 校园：有尊严的多样化	(42)
第六章 新一代的学者	(50)
第七章 学术活动与社区	(56)
附录一 1989 年全国教师调查	(60)
附录二 技术性说明	(88)
附录三 卡内基分类	(89)

谢 辞

这本书反映了很多人的劳动。我要首先感谢查尔斯·格拉希克(Charles Glassick)、波比·霍克斯泰因(Bob Hochstein)、玛丽·虎珀(Mary Huber)、基娜·梅罗夫(Gene Maeroff)和本基金会所有花了大量时间审定稿件、提出宝贵批评意见和协助编辑工作的所有同事。维托·佩隆(Vito Perrone)也经常参与这一过程并提出了一些切中要害的意见和建议。我要对所有这些作出了极其有益贡献的同事们表示谢意。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同事。目前任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系主任的尤金·赖斯。尤金(Eugene Rice)到基金会来任高级研究员时,我们关于教授职业的报告刚刚成形。我很感激他对这份报告作出了贡献。他建议参照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的文章《美国学者》将四类学术活动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考察。他的分类与我原先对学术活动分类的定义不谋而合。最后我们的劳动形成两本书。我的这份报告名为《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将讨论基本上限制在学术活动本身的范围内。另一本将要出版的报告叫《新型的美国学者》,它将使赖斯博士有可能更深刻地探索学术活动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更深刻地探讨正在出现的关于“求知方式”的争论。我期待着看到赖斯博士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一定会使关于当代生活中学术水平内涵的讨论更加丰富。

还应当提及其他同事对本报告的贡献。尤其要提到的是美国学会理事会主席斯坦利·凯茨(Stanley Katz),他和他的同事道格拉斯·格林伯格同意专门组织一次研讨会对书稿提意见。1990年7月,我们同下列著名学者聚会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玛丽安娜·培格曼(Marianne H. Begemann)、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丹尼尔·费隆(Daniel Fallon)、詹姆斯·弗里德曼(James O. Freedman)、理查德·斯洛金(Rechard Slotkin)、雨果·索纳斯凯恩(Hugo Sonnenschein)、琼·欣德·斯图尔特(Joan Hinde Stewart)、凯瑟琳·史汀生(Catharine R. Stimpson)、约翰·斯特拉斯堡(John Strassburger)、尤里·特伦兹曼(Uri Treisman)、玛格丽特·威尔克森(Margaret Wilkerson)。这些杰出学者花了两天时间评审书稿,他们的真知灼见导致了文本的重大修改。

美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罗素·埃奇顿 (Russell Edgerton) 对本报告的贡献比他自己知道的要多。罗素在我们关于本科生的报告发表后不久,就跟很多人谈到集中力量研究教师问题的必要。他鼓励我们就教授的工作专门准备一份报告,并把学术水平问题选为 1990 年高教学学会年会的主题,还安排了一次专门的、由主要同事参加的午餐会讨论我们的报告初稿。此后,又认真地审读了书稿。我对罗素的智慧和真知灼见十分感激。

玛丽·吉恩·怀特罗 (Mary Jean Whitelau) 和洛伊丝·哈伍德 (Lois Harwood) 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认真审读了卡内基关于教师的调查报告,帮助选择了同本报告最有关系的表格。辛达·格林伯格 (Hinda Greenberg) 和杨·赫佩尔 (Jan Hempel) 在珍妮·福斯特的协助下,负责整理了附录。我对这些助手们给予的协助也十分感谢。

在我们研究期间,欧文·斯佩茨堡 (Irving Spitzberg) 和弗吉尼亚·桑代克 (Virginia Thomdike) 还为了解现行评估和奖励制度中的实际做法向学术领导人作了一次调查。他们的发现很有价值,对我们考虑有关教师评估问题很有帮助。

我感谢理查德·米勒 (Rechard Miller)、陈洪源 (Hong Yu Chen)、杰罗姆·哈特 (Jerome B. Hart) 和克莱德·凯莱恩 (Clyde B. Killian) 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就教师对专业性活动所持态度进行的、尚未出版的调查资料。

书稿快定稿时,我还把稿子寄给了沃伦·布赖恩·马丁 (Warren Bryan Martin)、保尔·波伊尔和欧内斯特·小波伊尔征求意见。我从他们的回信中得到明确而集中的意见和丰富的编务方面的建议,使报告得到进一步充实。

其他几位的工作也应得到承认。劳拉·贝尔 (Laura Bell)、达恩·奥特 (Bawn Ott) 和凯丽·拉尼努 (Kelli Lanino) 负责对手稿进行了无数次的加工,完成了几乎是无法完成的紧迫任务,他们一直从事专业性工作,并自始至终表现了崇高的精神。迪·桑托斯 (Dee Sanders) 指导文字处理人员,协助进行设计,和卡罗尔·拉索拉 (Carol Lasala) 一起,完成了某些需要制作照相的过细工作,这份报告也是他们不懈努力的一个成果。

杨·赫佩尔负责从书稿到出版的装帧设计,这一项目从开始到结束杨一直同出版社密切合作,事无巨细都由杨负责管理。我深切感谢她对这一项目的贡献。

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凯,她深信这一项目的重要意义,鼓励我写作,并再一次大方地放弃了宝贵的家庭团聚的时间,使我能按时完成工作进度。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
E. L. 波伊尔 (Ernest L. Boyer)

前 言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访问了全国的一些大学和学院,人们重新注意大学本科生的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争论集中在核心课程和校园生活的质量上。尤其有意义的是,学生自己愈来愈关心学校把重点放到教学上。这些生气勃勃的讨论使我相信,美国高等教育的90年代将成为本科教育的年代而被人们怀念。

目前争论的核心是教师的时间问题,其他所有问题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实际上引起争论的是奖励制度,关键性的问题是:教授们进行什么活动最受到褒奖?总之,如果教师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得不到最终的承认,谈论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是从学术人员的工作方式如何逐步演变来开始这份报告的。这一方式从教学发展到服务,再发展到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内部和外部重心的转移。然后我们注意到,教师奖励制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如何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越来越扩大的时候变得越来越窄;我们思考了许多大学和学院又是如何陷入各种相互竞争的目标的交叉矛盾之中。

在当前的气氛下,学生常常是受害的一方。一些冠冕堂皇的小册子向学生保证,教学将得到重视,社区精神会充满校园,博雅教育是本科学习经历的核心。但是现实状况是,在相当多的学校,教学得不到鼓励,花了很多时间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咨询的教师,面临着愈来愈暗淡的提级和取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前景。

教师也是受损的一方。研究和出版物成为大多数教授取得学术地位的主要手段,然而不少学术人员之所以加入教师行列,恰恰是因为他们热爱教学和服务,甚至就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好。但是,他们的专业性的义务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我们面临的是很多学校存在着一种限制而不是保持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气氛。

学院和大学还因目标上的混乱受到削弱。卡内基基金会最近对学生生活的研究还表明,校园里社会分离和分裂现象增长,不文明的行为增加,人们关注社区精神的减弱。调查反映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大学都在加强对本校忠

诚的同时，寻求坚持多样性的方式。现在是提出教师奖励制度如何在这一方面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了。

根据目前的形势，最终受损的还是国家。当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把学术人员的工作和校园以外的社会和挑战结合起来。然而，如果把学校的使命规定得特别狭窄，或者如果对教师的奖励制度不适当地受到了限制，美国高等教育丰富的多样性和潜力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很清楚，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同时需要对服务有一个奖励性的承诺。

因此，我国的大学和学院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破多少年来人们已谈腻了的所谓教学与研究关系的辩论模式，以更富创造性的方式确定何谓一个学者。现在是全面认识教师的智力和高等教育应当表现出的巨大的多样性的时候了。

要使美国高等教育保持活力，我们就要对教授的工作有一个更富创造性的看法。为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在本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学术水平的四个观点——发现、综合、应用和教学。我们在建议这些活动时强调一点，我们的意图是引起讨论，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

最后，我们需要各学校之间少一些相互模仿，多一些以各自特点为自豪的气氛。是结束那种阻碍发展的做法的时候了。学校不应常常只根据其在外面的地位，而应根据由自己特殊的使命决定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让我们一致同意，90年代将成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十年。但是，我们也应坦率地承认，我们为促进教育，作出的努力能实现到何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确定学术水平内涵的方式，取决于学术水平受到奖励的方式。

第一章 学术水平内涵的演变

当我们几年前完成对大学本科教育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也是通向学术生活核心的一个问题,同学术水平本身的内涵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¹一书中说过:“学术水平并非一个深奥莫测的附属物。它处于教师职业生涯的核心。”“削弱教师对学术活动的承诺,就是破坏大学本科生的经历,不论其处于何种学术环境中。”依我们的观点,现在的挑战就是要以能丰富而不是对校园生活的质量加以限制的方式确定教师的工作。

今天,全国的学校到处都已认识到,教师奖励制度已不适应教师的全面的学术职能,教授常处于各种相互竞争的义务的掣肘之中。因此,关于教师究竟应当如何安排其时间的讨论愈来愈活跃,愈来愈多。最近,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要求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尤其是在更可能作出求职决定的三或四年级时。肯尼迪说:“现在是我们重新肯定教育,即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的时候了。”²

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了对大学本科教育进行研究以后建议,在确定授予教师终身职位时,应更多地考虑教学情况³。在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手册中已提出:“对学生的教学任务将在所有教师中分配,不论其级别和资格。”⁴在中部,麦克莱斯特学院院长罗伯特·盖温(Robert Gavin)最近重申该院关于大学文科教育使命的观点,认为不仅包括学术质量,还应包括国际主义,多样化和服务。⁵

这就是我们报告的中心议题,即一个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相信,回顾和反思期望学术人员完成的各种职能的时候已经到来。应当提出,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如何既同教师奖励制度,又同美国高等学校的使命结合起来。如果要把学生教好,如果要使所有教师的创造性都能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要使每一个学校的目标都能恰当地确定下来,这种对教师工作的调研就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自豪地谈及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大多样性特点时,现实恰恰是,很多学校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变得越来越窄,学校工作重点更多的是模仿而不是各具特色。在这种气氛下提出以下问题是适宜的:全国每一所大学和学院如何明确地确定自己特有的目标?各校之间对于教师表现的期望是否应当加

以区别？我们能否拥有一个兼容各种成功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

学术界的其他问题也不能回避，如行政结构越来越复杂，专业越分越多，学科的系常常是互不来往，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教育经历常常缺乏重心。很多人提出：全国大学和学院的工作如何更具智力上的凝聚力？对学术水平的内涵能否以使阐述性和综合性的工作得到更多承认的方式加以确定？

按照普遍流行的看法，成为一个学者就是要成为一个研究者，出版物则是衡量学术活动的主要尺度。与此同时，大量证据说明，很多教授对自己的作用感到模糊。这种学术职能的矛盾影响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减弱了学校的活力，对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面对这种矛盾，如何正确处理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是否应该让一部分教授主要成为研究人员，另一部分则成为教师？如何能对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更恰当地加以评估和奖励？

走出校园，美国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在发展——问题多的学校，预算赤字、污染、城市衰败和被遗弃的儿童，以上不过是一些最明显不过的问题。其他问题诸如酸雨、艾滋病、萎缩的能源供应和人口变化，超越国界，具有全球性。面对这一现实，人们越来越相信，曾一度使全国的高校充满活力的服务的观点应给予新的合法的地位。这挑战便是：具有各种丰富资源的美国大学和学院能否为国家 and 世界发挥更大的服务职能？我们能否以更充分地反映学术界和学术界以外的新的迫切的现实需求的方式来确定学术水平的内涵？

显然，当今学术界面临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与 350 年前这个大陆上建立起第一所学院时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学校和社会面临的挑战在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等学校的作用和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必须重新确定，以反映新的现实。

回顾历史，人们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活动经过了三个不同而又重叠的阶段。殖民时期的学院，根植于浓厚的英国传统，认为学校生活的注意力应集中在学生身上，培养其人格，培养新一代民众的和宗教的领导人。叙述 1636 年哈佛学院成立情况的作者说，在马萨诸塞定居的英国人确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发展学问，并传至后代”。⁶哈佛学院仿英格兰剑桥伊曼纽尔学院建立，目的在为“山城”提供源源不断的有学问的牧师，以便如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所希望的，为人类带来赎罪的光芒。

期望于这所殖民地学校的是教育和提高新一代的道德水平。教学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是被视为同牧师一样的一种献身行为而受到敬重。社会期望于教师的，很大程度上已由雇用这些教师的学校的宗教目的所表明。学

生智力、道德和精神上的成长已交由教师负责,如历史学家西奥多·本迪特(Theodore Benditt)所说:“雇用教授并非根据其学术能力或成就,而是根据其对宗教的承诺。无论对教授或学生,学术上的成就都不是优先重点。”⁷

这种依教学为中心的传统一直保持到19世纪。年轻学者始终是处于学校生活的中心,教授受雇时都明确,他们无论在课堂上或课堂以外,都是教育人的人。当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1869年任哈佛学院院长时,他又一次呼吁学者的形象应该是教师。他宣布:“美国教授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定时的和勤奋的课堂教学。”⁸

但是风向总是在变。一个新的国家形成了,高等教育的重心也从塑造年轻一代转移到建设一个国家。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罗多夫(Frederick Rudolf)是这样描述新一代教育家的:“所有人都被美国人对明天、对于美国人认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具有无可怀疑的能力的信心所感动。”⁹正是在这种气氛中,作为美国第一批技术学校之一的纽约特洛伊的莱思塞勒(Rensselaer)综合技术学院于1824年建立。罗多夫认为,莱思塞勒学院成为对人们的一个永久提醒者,“美国需要铁路建设者,桥梁建设者和各类建设人员;特洛伊的这所学院随时准备培养这些人,即使老校无此先例”。¹⁰

1846年耶鲁大学批准设一个农业化学和动物及蔬菜生理学教授职位。还是在这个40年代,哈佛校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强调他的学校在为商业和经济繁荣服务中的作用。学院牢记他的意见。当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问他的学生为何要到剑桥来学习时,他得到的回答毫不含糊:“在芝加哥,哈佛学院的学位对于我来说是值钱的。”¹²

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后来被称作《赠地学院法案》,使高等教育实用的一面得到大大加强。这一段历史性的立法把联邦土地赠予各州,各州用出卖土地的钱来支持文科教育和技能培训,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正在兴起的农业和机械革命。1887年《哈奇法案》(Hatch Act)规定联邦提供资金,建立由大学管理的农业试验站,把知识带给农民,又为这一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这种强调教育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民主职能的思想如燎原烈火迅速传播。

维拉·凯德(Willa Cather)在对她在1890年内布拉斯加大学同学和老师描述中,揭示了这一令人激动的时代的某些场面:“他们直接从玉米地里来到了大学,口袋里只揣着夏季打工的几个钱,整整四年忍饥挨饿、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以一种真正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完成了学业。我们的老师与此出奇地相称:他们是到处流动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中学教师,破落的教堂牧师,少数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热情的年轻人。这里有一种奋斗的气

氛，期望的气氛，对于这些几年前刚刚呈燎原之势的教育新思想中升格上来的年轻学院充满了光明和希望。”¹³

这样，曾经主要致力于学生智力和道德成长的美国高等教育增加了服务的使命，并且，公私立大学都接受了这一挑战。1903年，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宣布：“整个20世纪大学运动的方向将是现实和实践性的。”¹⁴到1908年，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声称：“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以能培养出有服务能力、有现代民主精神的人而自豪。教师和学生都被为民主社会服务的愿望所深深激励……所有大学都自诩他们培养的人有服务能力，把培养有服务能力的爱国者作为他们的理想产品。这是关于学校功能的一个彻底的民主概念。”¹⁵

怀疑论者幸灾乐祸，甚至对他们认为的过分强调应用性表示藐视，他们一直反对把大学本身变成一个有更多民主的机构，并对伊兹拉·库奈尔（Ezra Cornell）1860年发誓“建立一所任何人可以学任何东西的大学”表示不屑一顾。¹⁶有些批评家甚至视农业试验站是对高等教育使命的一种背叛，他们嘲讽“牛仔学院”，认为它们降低了学术水平。其他人则对年轻人中的非精英者将涌进大学这一思想犹豫不决。

不过，一批批学术人员还是涌进了赠地学院，他们有信心，认为他们不仅有专长，也有为建设国家作出贡献的义务，他们体现了爱默生精神（The Spirit of Emerson）。爱默生几年前发表讲话，认为：“行动的学术水平是原料，知识分子由此才能塑造出他们优质的产品来。”¹⁸按照这一传统，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州长在威斯康星培植了大学与州的联系，即后来闻名全国的“威斯康星思想”。¹⁹社会批评家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于1909年访问麦迪逊（Madison）后说：“在威斯康星，大学与聪明的农民的关系，犹如农民的猪圈或工具房同农民一样接近。大学实验室成了精明的制造商的工厂的一部分……”²⁰

这种教授可以传播知识以提高农业和制造业生产水平的思想，促成了后来产生的所谓应用性研究。到19世纪70和80年代，很多人都认为，教育应被人认为是有用的。历史学家在评论学校同农业应用研究的关系时曾作过生动的描述：“一个农业教授的主要活动就是用各种肥料在地里做试验，就是办好一个示范农场而不出现财务上的亏损，希望不亏损但往往很少做到。”²¹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这类农业科学迅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学者们

拉用知识

在这一发展时期，服务的功能还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它的目的不仅是服务于社会，还要改造社会。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